

哲学

Diary

V. 布莱登伯格:1926 年出生。在茵斯布鲁克和罗马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1963 年在罗马任控制论和信息科学教授。弗莱堡(生物学)和图宾根(物理学)荣誉教授。

P. 格洛茨:1939 年出生。现为埃尔福特大学通信科学教授、校长。曾任慕尼黑大学副校长及联邦教育部国务秘书、柏林科学与研究市政委员等职。出版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交流科学、联邦政治、政治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包括三本政治日记。

O. 马库阿德:1928 年出生。1954 年于弗莱堡获博士学位。1963 年在慕尼黑大学任教。1965 年起任基森大学哲学教授,1993 年退休。1982—1983 年任柏林科学会会员。著作有《告别原则》、《偶然性辩解》、《美学与麻醉剂》、《怀疑与认同》等。

G. 阿申巴赫:1947 年出生。学习哲学、心理学、文艺理论、教育学、戏剧学、音乐科学和神学。1981 年获博士学位,导师是马库阿德。1981 年建立“哲学实践所”自 1982 年以来任国际“哲学实践协会”主席。著作有:《纯粹和实践哲学》、《哲学实践》等。

H. 布隆科霍斯特:学习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1974—1982 年,学习、获博士学位、任大学教授。1997 年起,任新成立的弗伦斯堡大学社会学教授。著作有:《T.W. 阿多诺 现代的辩证法》、《失去魅力的知识分子》等。

V. 赫斯勒:1960 年出生。学习哲学、印度学和古希腊语文学。1986 年在大学教授哲学。自 1993 年起,任埃森综合大学哲学教授。著作有:《当代危机与哲学的责任》、《生态危机的哲学》、《现代社会中的实践哲学》、《哲学史与客观唯心主义》等。

T. 凯塞林:1948 年出生。自 1992 年起任伯尔尼大学哲学私人讲师。瑞士教师培训机构“朗根塔尔国立研究院”院长。著作有:《发展与矛盾》、《二律背反的创造性》、《具有人的特色的发展》等。

哲学有何用

V. 布莱登伯格、P. 格洛茨和 O. 马库阿德谈话录

主持人：G. 阿申巴赫

(节目的首播时间为 1988 年 1 月 25 日)

阿：“哲学有何用？”——这并不是非哲学家的问題，而是哲学家的问題。哲学家们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阻止哲学陷入陈词滥调，哲学家用这个问题又同时可以使哲学在不断变化的自我理解中得到更新。所有科学中最古老的一门就是以这一方式永葆青春的。我们不要惧怕这一问题：“哲学有何用？”V. 布莱登伯格是图宾根马克斯—普朗克生物控制论研究所的教授和所长。V. 布莱登伯格在这参加讨论的原因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用人文科学方法进行思考的自然科学家，也是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人文科学家，简单地讲：一个中间人。这一走边界的方法使 V. 布莱登伯格成为我们自席勒之后所称的“哲学头脑”。作为一个哲学头脑，您在工作中是否还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或者说，您这么过多地思考哲学问题是否有损您的好名声？

V. 布 这你得问我的同事。在我们的圈子中，不同形

式的思维是被允许的。毫无疑问，哲学也一样。问题只是，哲学被看做是无害的业余爱好，还是被看做是长期有损于良好道德的东西。我相信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在当前的自然科学中人们又开始更多地进行哲学思考，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物理学中，而且也发生在生物学中，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或者换一种说法：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人们又重新把自然科学看做是哲学的孩子并使自然科学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这样做也许对于所谓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科学发展来讲也有积极的影响。

阿 向您问一个简短的问题 最近您出了一本书，名字叫《聪明》，副标题是‘非科学性散文’您是在这样一本书当中还是当您从事科学研究时更像一位哲学家呢？

V. 布：这个问题很聪明，我相信当我尽可能诚实和认真地从事科学研究时，我就是最好的哲学家。

阿：我们同样有理由称我们的第二位客人是一个哲学头脑。P. 格洛茨的职业是政治家，但他经常发表一些人们对所有政治家都不能讲的、彻底的和根本的看法。1987 年，P. 格洛茨在《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沉思的、内容广泛的文章：《左派的困境》。这篇文章受到广泛讨论，其命题是，左派目前正受困于哲学的迷惘。格洛茨先生，情况到底如何？知识分子从政是否比一般政治家更难？另一个问题是：您的政党今天在某种意义上也把自己看做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组织，那么，工人们理解

您在他们面前所做的那些哲学思考吗？

格：伟大的工人政党从来就与知识分子一道共事。但是没错，过去和现在都有困难。

R. 希尔弗丁有这些困难，罗莎·卢森堡的困难也不少，但我并不想与他们和解。当然了，今天的政党也有困难。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得非常好，比其他政党更好。H. 耶尔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职位上退出来，比登科普夫在基督教民主联盟里大受指责，而达伦多夫则自称被“流放”了。而我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始终是主席团成员。我不相信我写的文章会令所有社会民主党党员感兴趣。但是也不必如此。没必要每篇文章都有百分之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去看。但我也为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撰稿，那时，我实际上是尽力令所有社会民主党成员都有兴趣一读的。

阿 说简单了，不是每个进行哲学思考的政治家都会面临政治生涯危机。

格 你说得对。H. 埃姆科常对我讲 彼得，你要再这么大量地写下去，你会被人们加倍喜欢的。这也许是对的，但我坚持这么做。

阿 本轮谈话的第三位客人是 O. 马库阿德，基森的退休哲学教授，也是一位职业“哲学头脑”。马库阿德受邀访谈，不仅因为他是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或是位非常独特的哲学家，还因为他曾是德国哲学总协会主席，他

在某种意义上有责任代表职业哲学家行会发言。

马：我在当主席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在与这个问题打交道,我的答案是 哲学家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属于不同流派。如果你想代表行业利益,你就必须有广泛的视野。你不可以、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认识真理的方法,让自己闭嘴。

阿 好吧,来谈谈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马库阿德先生,哲学有什么用呢?

马：没有哲学我们就无法生活——这是我的一般性回答。哲学在今天有什么用处呢?我对此能想到的标准答案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以加速度变得越来越失去方向的世界。我认为,这就使寻找方向的需要变得强烈起来。如果我正确理解了的话,哲学的任务就是指明基本方向。当寻找方向的需要‘增长’时,哲学总是变得炙手可热。这——更富戏剧化的表述——就与人们常说的那个命题相矛盾,即哲学越来越没用,就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加现代,科学更加昌盛。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科学越发达,越精细化,哲学就越发显得不可或缺。命题的表述就是 现代世界越现代,哲学就越重要,情况历来如此。

阿 格洛茨先生,您与 ①. 马库阿德的观点肯定是一致的,即哲学很重要——我从您的文章里已经读出这点了。问题是,是否可以触及到一个重要的哲学,还是找不

到它。

格：是这样的。即便是反对哲学和不需要指明方向的人，也会听任哲学摆布。我的命题是 现在最有影响的两位哲学家是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傅科和其他法国人把他们重又引入德国舞台。有那么些人反对所有东西，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例如，他们反对某种东西，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海德格尔的主张。因此，首先应该认同马库阿德先生的基本命题。我所反对的是两类哲学家，我称他们为道德说教者和意义中心论者。道德说教者不再沉思任何确定的、客观的结构，例如经济结构，他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释为道德问题，最终陷入做好人、有好品德的纯粹说教。这对我们复杂的世界来说绝对不够。

意义中心论者我们刚刚在历史学家的争论中见识过。他们主张人必须要有某种内在的稳定性，否则就会粗野无礼，人们需要像德意志民族国家，德国人的统一性或类似的东西。他们臆想出一部历史，一部非常感人的历史，例如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为了打动别人，使他们干一些事情 支持重新统一，推倒柏林墙等等。我反对这两种方式的对哲学的滥用，或者更准确地讲，对哲学的工具化。

阿：这个问题我很想再谈谈。马库阿德先生首先很一般化地提到 哲学是必要的。您又说 有一些有现实意义的哲学，如尼采和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我想有分寸

地讲：我只提尼采，而海德格尔是个特殊情况。

我想指出一些非常确定的事实，即如果哲学是必要的，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我是从您这儿看到的，即我们过去的那种哲学——我想称其为“左派哲学”——现在度日维艰。我这么说也许会激怒了它。您会说：在我眼里发展的走向是从马克思到尼采。我很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先引述一句大家都知道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的名言，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11 条这样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的问题是这一命题的精神要求是否像古老的措辞“重要的是”^①一样已经过时了呢？

格 我认为，在哲学当中也有一种经济学循环那样的东西。一位被从德国驱逐的犹太科学家 A. 希尔施曼写了一本论述交战与失望的循环的极有趣的书。他说：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某些事情失败过后，人会很沮丧。人们在失望时就会谈尼采，这就是说，在交战与失望的往复循环中，交战的年代又出现了。您应该观察一下 1987 年由 40 名高等学校教师发起组织的讨论启蒙的未来的法兰克福大会（我也参与这次大会的工作），那么，您就会注意到，人们又在试图反对过去 20 年或 10 年的传统。这时人们就总是回到哲学，有时是现实哲学，有时是很旧的、古老的哲学。

①重要的是：德文“es kommt”，现在通常写作“es kommt”

阿 这样说来,尼采是不是一个失望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出现了?

马 对于一些失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讲,尼采肯定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哲学家。但从根本上来看,仅在马克思、尼采之间作选择太简单。在这里坐着的诸位肯定会挑选出一些中间之物。毋庸讳言,海德格尔在我看来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但是,人们实际上会问 什么是哲学的任务?让人抱有幻想,还是让人清醒?我想两者皆对。按照我的看法,在一个过分强调幻想的时代,完全有理由出现一种反对行动,在这一点上我赞成以清醒为目的的循环理论。是否需要再来一次强调幻想的反对运动,这要由哲学家来看。我认为两者都属于哲学。你只能用哲学反哲学。值得争议的只是,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什么是错误的哲学。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只有哲学可以帮助反对哲学,因而哲学是必要的。

阿 所以格洛茨又进了一大步,他说 不要问我们是否需要哲学,要问我们需要哪些哲学。

V. 布: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有些不人流,我与人们在此所做的不同,我对哲学的看法不一样。这是因为,我的中学哲学教育几乎没有超越苏格拉底以前的学派。在那时,哲学实际上与科学是同一的。哲学有什么用处这种问题就跟为什么要学习、要求知这样的问题一样。答案也许是一种在生物学上很原始、也就无法再论证的东

西。人就是如此,就像袋鼠要跳跃,猿猴要爬树,人要思想,要获取知识,对知识进行语言加工并讨论知识。如果你不想展开生命进化理论的全部历史,你就无法解释人为什么要思想。

那么哲学有什么用呢 我认为哲学是母亲、母体,其他科学从中纷纷脱离出来。从前如果有人对哲学家说,他不理解这些儿女中的一个,哲学家会感到受了羞辱。哲学母亲与所有孩子谈论并感到对一切事物都有责任。但有一天屈辱发生了,各个解放出来的儿女发展出一种父辈不能也不想理解的语言,如数学、物理语言和其他形式化了的知识分支的语言。因而,哲学被消极地定义为残余物,它是所有精确科学分离出去之后的残余物。个别科学的诞生过程是在哲学内出现的,而它们的独立化过程远未结束。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那真是悲哀。最近诞生的某些科学还带着哲学味,但它们已经骄傲起来了。举个例子,就是语言科学,语言科学的推动因素是语言的计算机程序化,而使语言不断精细化的因素则是一种压力,即把语法、语义和一切相关事物进行比目前所做的更加精确的定义。而在此负责的是些哲学家。人们不需要理论物理的那些很难学会的行话。只需要聪明人,这类人可以在哲学家那里找到。同样的情况还有,一百年前心理学独立为一门学科,而最近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又成为了“认识科学”。

阿：听上去像是伟大的哲学母亲净生了些小科学。

孩子小的时候，母亲特别重要。可当单个的科学长大后，自己能跑时，它们就不再需要哲学了。

马 当它们长大后，它们离开哲学并说 我们不再需要所有这一切了。可当它们成熟时，它们又说 我们现在又需要哲学了。您没见到这种情况吗？

V. 布 没有。我认为哲学完全有能力生育孩子，这是她的职责。倘若这位母亲屈辱地缩回去，想成为别的什么并因此而剥夺了自己始终还拥有的可能性，那就不对了。

马 布莱登伯格先生，我想直接说几句话。您首先持一种对我来讲再熟悉不过的论点，因为我在 12 年前的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一主张。科学产生于哲学。而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一无所有。我们哲学家又在做什么呢？我们顶多有一种可能性，即补偿我们的无能。相当一段时间这是我的一种阴暗的观察方式。

格 科学是补偿，可以这样说吗？

马 对我来讲，这曾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开始。但后来我又看到了 H. 普莱斯纳的书《迟到的民族》。普莱斯纳的观点令人信服，即哲学陷入一种困难的境遇。它看上去像是多余的了。但恰恰在与这一困境的斗争中，哲学得到了重塑，它发现了新的、重要的领地。这一过程的发起者是康德，那时哲学家们说 科学出现了。我们现在必须问 科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康德把这件事叫做批判。人们后来说 哲学的伟大尝试，即创造意义，使意义符合道德准则，失败了，我们对此感到失望。但我们却发现

不曾见到过的东西,即诘问幻想,揭露幻想,也就是说,用艺术的办法对待失望。这就诞生了意识形态批判。当哲学失去对分离出去的科学的管辖权时,它又同时获得了新的权力,它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这些权力的。这样一来,哲学也许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明它对于其他科学是有益的,在今天,其他科学也不是单个行动了,往往当科学家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所谓的跨学科、跨专业的问题时,科学家们的努力才最有成效。

V. 布:作为哲学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我就是这样),我很愿意让您担当起道德说教者的职责,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机构来创造性地而仅仅是保守地去认真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则,不断从新的角度反思和确定各种价值。一个人的胚胎的价值有多大?试验室里的一只猫的价值有多大?一个老年人的价值有多大?这些问题出现在一个以时尚为主的时代,时尚总是很容易突变到反面,因为我们没有对以下情况的理论,即在对立的、不能统一的观点达成妥协时,我们最终会痛苦地发现什么。哲学家不能回避这一责任,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提出取代这些价值的守护神神学的要求。

格·布莱登伯格先生,我认为,如果我们两人——也许强调的方面不同,我们反对道德说教,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伦理学。我们只反对无意义的道德说教。这就是说,一种单个学科如经济学完全可以描述与解释的联系,如果用道德的指向人的内在性和灵魂的劝戒与说教来解释就只能是无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伦理学是无意义的。

阿：我想在这个地方提出两种区别。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两个完全不同、但却又有联系的事情。一方面是哲学与科学的严肃的联系。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再加上一点：如果单个学科完全脱离了哲学,那么这些单个科学究竟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格言：科学不思考,对不对？这是有可能很危险？这是一个事情。另一个事情是：不进行哲学思考时,我们又有什么？我猜想,人们会把您刚刚讲过的所有内容都与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当我们不再进行哲学思考,不再有哲学头脑时,就会出现道德说教,出现思想模式,就会出现各种主张和令人激动的想法,就会有战争。尼采嘲笑道 我们没有哲学时,就有新闻出版。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进步,不是这样吗？

格：不是。我想就布莱登伯格先生刚才讲的话再说一点儿我的主张。请您看一下胚胎研究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直到以下这些问题 在今天,科学家到底可以干什么？他能进入人的思维吗？这些问题应该立法。我个人担心的是,禁令来得太快,人们会害怕幻想的产生,人将成为上帝并制造出可怕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这会导致我们过快禁止一切可能的事物,因而也使我们失去在将来与遗传病作斗争的可能性。我现在还认为没必要。而从业医生则对我讲：没必要真的用人类胚胎做实验,可以用老鼠来做。

阿：不久连这点也不能做了。

格 谁知道将来如何呢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哲学反思无疑都不可能得到理性的回答。用哲学反思是否就能理性地回答它们,这要看哲学家的了。

V. 布 格洛茨先生,我只是认为,哲学家不去做,那些代表有政治分量的思想的人也会去做。

马 您问过,哲学不存在时会出现什么 我要说,不会出现非哲学,只会出现一种坏的哲学。那时骗子们会大行其道……

V. 布 :……格洛茨式的意义中心论者……

马 我想就此问题说点想法。首先,格洛茨先生 伦理学很重要。我理解您的道德说教概念,您想说明,有一种用抬起的食指代替头脑的趋势。人们不该放弃思考。人们必须重新使用头脑思维,同时也要偶尔在提出这类伦理学问题时放下食指。我很惊讶地看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出奇地一致。这首先意味着,人们要让自己精通业务,就像一个法官要断一个他还不具备专业能力去处理的案子一样,哲学家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让自己熟悉并精通业务,他们不能认为,他们的哲学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所不知。他们必须设身处地想问题,必须倾听,实际上他们必须尝试在各个科学领域能够重新获得发言权,这些科学的情况有可能变得很差。如果那时出现了伦理学问题,也可以从哲学角度来严肃地探讨这些问题。

我担忧的是,会出现伟大禁令的伦理学。我的问题是:这本身不是很危险的吗?这不会导致一些人们可将

其描述为启蒙与废除效果的次要后果吗？因此，我支持一种非审查的、温和的伦理学。人们必须要谈论这个问题，不仅要谈论温和的神学，也要谈论温和的伦理学。

格洛茨先生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意义中心论者，我自然要反对意义中心论者。我想说的是，如果哲学家变成大袋鼠，那么他们的哲学就有问题了。哲学家应使大袋鼠退出舞台。换句话说——至少对我来讲，也许这就是差异的开始——，意义问题是走下坡路的。我很愿意谈论意义所期望的营养学。就如同慢慢肥胖起来的人应该遵守饮食疗法一样，意义要求也最好遵守饮食疗法。

格：我一直没找到我可以与您争论的问题。

马阿申巴赫先生一开始就朗读了一句格言，这句格言以特殊的方式把所有使哲学家从您的文章中获得幸福的内容联系起来。您说过，左派根本就没有哲学，左派已经失去了哲学，因此左派的境况不佳。但是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为了左派而存在的哲学家 H. 吕伯，然而左派却总与其失之交臂。我们现在肯定要吵起来。

格：不像您想的那样。我如果刚才和道德说教在论战，那么我也可以与吕伯论战。吕伯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也许他现在仍然是。在学生运动斗争中，我们当然在无数问题上，从高等学校政策的角度看都意见不同。我想，我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怀疑人文科学是补充性科学的说法。比如说，在现在的高等学校的冲击运动中，人文科学被打击得厉害，因为人们认为，只有技术是现代化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

的错误。人们也许要减少开支。我也要这样做。但是说我们都不需要人文科学——你看谁还对埃及学感兴趣呢 这就真的有点短视和错误了。我认为,人们不应该按照以下格言来宣传一种理论:自然科学家负责真实性与真实性的发展,而人文科学家则负责安抚人们,一切都不像从前那么好了,不像人们所认为的从前那个样子了。如历史或哲学所做的事情。这是一种错误的补充命题。

我要批判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对清醒和保持幻想的清晰区分。我倒是非常乐意在这两个极端的事物中间住下来。在有些时候清醒是必要的。当人们变得歇斯底里时,就得让他们清醒下来。相反,有些幻想我根本就不想要,因为它们毫无道理,会使人遭遇不幸。我想用一个例子说明现在重又时髦起来的东西。我刚刚提到了海德格尔。您也说,他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实际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对天天把什么都弄进形而上学、弄进惟一的形而上学、弄进烦恼的做法不以为然。人们没法活了,因为天天就生活在烦恼中。相反,我认为 H. 布鲁门伯格的这本小书《烦恼渡过河流》颇为精彩。这本书与 P. 汉特克的小说《缺席》形成对照。《缺席》里隐含了对实际生活的强烈鄙视,士兵、妇人、几位神秘人物都从这一可怕的现实里出走。这种倾向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生活艺术,我认为这种艺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艺术越来越多地控制了人们,这些人退回到他们的小花园,自作多情地说:历史反正也是无聊的。我反对这么做。

阿 简单地讲,左派始终与某种变革哲学相关,与某种积极的变革哲学相关——所以我才引用了那段著名的马克思的话。现在哲学家坐在你们的对面,他自得其乐并且很认真地要修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 11 条,他说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世界 重要的是宽恕世界。我现在没有问:O. 马库阿德是否是致力于让左派失去哲学基础的哲学家?很多人说:如果这类马库阿德代表了哲学的话,那么保守主义就会有出头之日了。L. 施贝特最近讲,他看到哲学的辉煌之日到来了,因他注意到了,过去是社会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天下的所有重要的科学活动,在过去的一年[1987 年——编者注]里突然被哲学家抢了风头。问题却是:什么样的哲学?还是变革哲学吗?是不是宣传员?是不是观察与限制的哲学家,怀疑论者、保守派、观察员和唯唯诺诺的人,而不是批判者?

马:我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我肯定参加了施贝特在这里所指的一些活动并发了言——,当然有一部分哲学家是怀疑论者,但不仅如此。我相信,你可以把 J. 密特施特拉斯看成为怀疑论者。我认为施贝特的印象源于与各哲学家的接触。也没错。施贝特在他的简短采访里也提到了人文科学问题,提到了文化问题。他被问及 您作为高技术的推崇者突然又成了文件的发现者,这是为什么?他是在个别背景下才说了这句话的。

格 但是,马库阿德先生,他只是在玩时髦。没错,哲